

人·自然·文化

——试析中欧生态认同

林红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摘要: 自然作为一种人为的概念,一直以来都是以失声的客体形象出现在人类发展的历程中。而另一方面,人则作为思维的主体不断改造自然,缔造文化。最终,人成为了文化中的人,自然也成为了文化中的自然。于是,分立的人和自然便在文化的意义里获得某种程度的同一性,这便是生态认同。本文试图通过对中欧生态认同的比较分析,针对生态、文化所涉及的相关问题提出些许解释。

关键词: 生态认同 文化 中欧

中图分类号: G1 **文献标识码:** A

“人们总是会想当然地认为自然不同于文化或者环境有别于生物体,甚至,如同生物体一样,文化也是一种自发的产物…我想要说的是,在人类世界中,文化需作为第一要素,而自然则是自在的…西方人所知的“自然”只是一种人为发明的产物”。而在中国,从“天人相分”、“天人相胜”的曲高和寡到最终“天人合一”的势不可挡,国人终陷于“天蔽于人”、“人蔽于天”的纠缠而使真正意义上的“天人合一”成为不可企及的理想状态。无论东方抑或西方,在人类创造文化并被文化化的过程中,自然也最终被文化化,成为了一个纯粹想象的概念。但同时,由于各自路径的不同,也赋予了这一同质的想象彼岸以相异的内容。

一、人·自然·文化

1955年,美国学者J.H.斯图尔德最早提出“文化生态”的概念。在其后的发展中,从初时“跨文化的同一性”到适应制度导致的文化多样性,文化生态学逐渐完善了人类作为思维主体对人、自然、文化三者的理解。它主张从人、自然、社会、文化的各因素相互作用中研究文化发展的规律和特殊形貌,而这其中涉及一个重要的解释概念“适应性(Adaptation)”。“适应性(Adaptation)”是生态路径的核心所在,是指生物体、人类和非人类对各自周围环境的结构及功能性特征所作出的反应”。正是在这一适应过程中,人类创造了多样性的文化,形成了对各自生存环境的认识,成为了多样性的文化人。

在中国的文化地图上,我们最能够体味“多样性”的内涵。粗到南北分立的两大派系,细致齐鲁文化、三晋文化、关东文化、吴越文化、海派文化、岭南文化、甘陇文化、巴蜀文化、滇云文化、新疆文化、藏文化等林林种种。俗语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些各态的文化与本土各异的生态地理环境息息相关。人们在适应不同环境条件的同时也造就了不同的地域生态性文化。

北方文化中有“东北十大怪”:草坯房子篱笆寨,烟囱安在山墙边,窗户纸糊在窗外,四块瓦片头上盖,十七八岁姑娘叼个大烟袋,养活孩子吊起来,大缸小缸渍酸菜,包米碴子芸豆饭,豪饮啤酒论箱买,宁舍一口饭不舍二人转。而南方文化中则有“云南十八怪”:山间铃响马帮来,袖珍小马有能耐,火车没有汽车快,石头长到云天外,山洞能跟仙境赛,姑娘四季把花戴,常年都出好瓜菜,鸡蛋用草拴着卖,摘下草帽当锅盖,竹筒能做水烟袋,蚂蚱当作下酒菜,四季衣服同穿戴,过桥米线人人爱,米饭饼子烧饵块,种田能手多老太,娃娃出门男人带,有话不说歌来代,东巴文化名在外。气候、地理、资源等生态因素在成就了各地丰富多次的文化风格的同时,其自身也成为了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

行走于欧洲，到处可见形形色色的教堂。推开拘谨沉重的大门，内里纵深而去都是浓墨重彩的彩绘玻璃，悬于壁上的大师画作，立于身侧的大理石雕像，远高于人视平线的窗户，透进昏昏的阳光，与昏黄的烛光辉映，和着陈年的味道，带给人一种隔世的神秘。教堂文化沉淀了欧洲大陆从爱琴海文明沿袭而来的物质向往和犹太教的“原罪”、“救赎”，见证了基督教鄙视现世的超越式的浪漫精神，更昭示了新教的平等理念和世俗生活的神圣化。瑞士精细的轻工业、荷兰人的恋花癖、德国的黑森林、法国人的葡萄酒、阿尔卑斯山的旅游业……人都说欧洲是上帝的福地，一致的宗教文化，却各有各的地域特色。当我们谈及欧洲时，眼前映现的便是形态各异的教堂、舒展起伏的绿地、清澈冰凉的流水和娴静的森林，然后才是这片大陆上个性、爽朗而又悠然的人。

中国与欧洲，在各自的地域上形成并传袭了风格迥异的文化，同时也塑造了不同文化性格的国人，从而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了各自关于人和自然的理解即生态认同。

二、生态认同的意识层面

生态认同指人们在与自然的关系中建构自我的种种不同方式，表现为个性、价值观、行为方式和自我意识，自然成为一个认同坐标；从个人层面来说，生态认同表述的是我们如何在与自然的关系中去延伸自我意识，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去认同；具体来说，每个人生态认同的方式反映了他/她对生态关系的认知。那么，中国和欧洲两者的生态认同有何异同呢？

首先追根溯源。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分析道，中国文明与古代埃及、巴比伦以及印度文明的发源地同属大河流域，但前者地域广大而水系复杂，后者地域较小而水系单一。不同于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及印度河，黄河、长江的干流并不适合灌溉，真正构成中国古代文明摇篮的实际上是流入黄河河东部湖泊的支流水系，如汾水、渭水、泾水、伊水、洛水、漳水、洹水等等。更具体地说是起源于古代被称为“汭”的河流交汇地带，如唐虞文化、周文化、殷商文化等。这些水系流域一方面具有相对的封闭性，另一方面则又具有开放性。它们足以聚集一定数量的人口组成自存自立的社会并抵御外来入侵，同时又可以将自己的文明与其它小流域相融合，共同组成更大的社会，创造更高的文明。但是在对外交通上，中国大陆东南滨浩瀚无际的大洋，西南靠险峻的横断山脉河酷寒的青藏高原，西北接漫漫黄沙的沙漠高原。故而在中国文明的形成初期，这些地理条件便成为与外交通难以逾越的天然障碍。这样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中国灿烂的农业文明和成就了关注内在道德修养及现实经世致用的儒家文化。而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则在现世的生活中实践着自身文化所赋予的伦理意识：墨守成规、利命保生、德化修养、大而一的协调。

而作为欧洲文明发源地的希腊海域，陆海交错。希腊半岛三面环海，有着世界上最为曲折德海岸线和优良海港。爱琴海中岛屿星罗棋布，形成通往小亚细亚半岛西岸的天然岛桥。岛屿上陆地山岭河谷层叠，被自然分割成狭小的地区，没有宽广平坦的沃野，土地贫瘠，夏季少雨，农业生态条件恶劣，但却有丰富的矿藏和陶土，从而为手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身处这样一种地理环境中，古代希腊人的粮食不能自给，但却拥有发达的手工业和种植业。为满足生活需求，希腊人利用便捷的海上交通从黑海沿岸和埃及等地输入谷物，同时又向地中海各地输出陶器、葡萄酒和橄榄油。频繁的商业活动进一步带动了航海业、造船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并极大地促进了各地区间的人口流动。在这样一种动态的历史过程中，欧洲人便也被烙上了所谓“海洋文明”的印记：追求新奇、舍身殉道、超现实的浪漫情怀、自我否定的焦虑、二元分裂和对立。

其次，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社会历史过程中，儒、释、道三家历经岁月沉淀为中国文化最本质的构成。这其中，虽然儒家文化在世俗作用力下成为了主流，但佛家和道家却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佛教缘起论主张一切现象都是由于相互依存、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即一切缘起现象都是依因托缘而起；故而众生平等，互为因缘，互不排斥，需和谐与共；且“诸行无常”，因缘无常，万物既和谐相处又处于因因果果的循环变化之中。在佛家这里，人与自然共处于缘起关系之中；人与自然万物皆平等，人需修持实践，有为他人献身的精神。道家始于老子，最早提出了人在宇宙自然中的位置：“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把人与天

地并列且同源於道，故人需平等以待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指出人类必须顺应自然之性，遵循自然规律，不自行主观干涉自然界的发展，以人役天；“胜人者有力，自强者强”，提出人类需懂得自制，在顺应道法的同时节制自己的行为。中国历代王朝尊儒家学说为主流，称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故而儒家所倡导的“天人合一”也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经典阐释。但是，这一理念终究只是一个理想图式，并未在现实中得以实践。或“天蔽于人”，或“人蔽于天”，中国人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只是极左或极右，终未真正实现理论解释中“天人合一”理想状态。虽然儒、释、道三家在解释人与自然关系时都提出了平等的理念，但现实中却实践的是儒家世俗的伦理道德。看来似乎消解了主客二分的“天人合一”，也仅仅是一种世人所追求的理想状态。

源于希腊文明和希伯来宗教的欧洲文化，其两大文化基因便是理性精神和宗教精神。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最早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确立了人类的中心地位。之后基督教兴起，《圣经·创世纪》记载：上帝创造了人和万物，他最喜欢人类，希望人类繁荣昌盛，能够布满地球并征服地球，统治万物生灵；上帝在用洪水毁灭地球前对诺亚许诺说，地球上的所有动物都是用来供你驱使，为你服务的，我把它们赐予你；由此，宗教又赋予了人类管理、支配和征服自然的权利，人成为自然的主人，承担主宰自然的天职。而到了近代，人类理性通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得到了进一步的张扬。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说“我们在认识了火、水、空气、诸星、诸天和周围一切其它物体的力量和作用以后（正如我们知道我们各行工匠的各种技艺一样清楚），我们就可以在同样方式下把它们应用在它们所适宜的一切用途下，因而使我们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和所有者”。而后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名言“人是自然界最高的立法者”更为世人所追崇。欧洲主客二分所确立的人类中心主义在近代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被实践得淋漓尽致。这也使得对人类力量无比自信和推崇得欧洲，在初尝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物质享受的同时，也开始体味自然的愤怒。

我们由此可见，承袭农业文明个性的中国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在意识层面是认同自然的，倡导大而一的平等和谐原则。而源自海洋文明的欧洲则将人置于自然之上，在其生态认同中，自然是失声的；这样的一种认同实际上是人的自我认同。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两者虽然在思想根源上和文化历程中存在极大的差异性，从而导致两者在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形成的整体生态认同截然不同；但是实践层面的现实从某种角度来说却有着一定的同一性。

三、生态认同的实践层面

中欧生态认同在文化思想渊源上存在的反差在实践层面上则获得了某种消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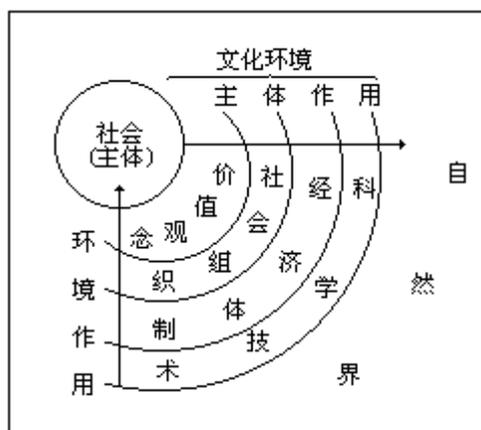
中国传统文化中倡导的天人合一，在实践过程中则被分解为或天从人意，或人从天意，而无法真正实现天与人的中庸。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中国人天人合一的理想便寄托于被尊为天子的历代帝王。“天子”作为天与人的“中庸”概念，但实践的却是人的意志。据史家考，黄土高原在周代时曾是一片绿色的草原和丛林，但经过历代“天子”强横专制的开垦破坏后，至北宋时已成为荒漠；黄河原称“大河”，但到了唐朝已面目全非，只能以“黄河”称之，后经历代垦荒方造成黄河流域水患剧增，母亲河变成了真正的洪水猛兽；而西晋时战乱，中原人口大量南下，从而又给长江中下游地区带去了生态祸患；同时，历代帝王为彰显皇威，追求奢华而大兴土木，不仅大规模修建生时所居宫殿，更为自己建造死后陵墓，给生态环境造成难以弥补的创伤；而宣扬人与自然众生平等、自制自律的佛家和道家也不遗余力地大肆修建佛寺道观，开凿石窟，成为破坏自然的帮凶；经历百年战乱人祸之后，中国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对自然的破坏变本加厉，据资料统计，我国城市垃圾历年堆存量已达 60 多亿吨，侵占土地面积达 5 亿平方米；七大江河水系中，完全没有使用价值的水质已超过 40%；全国 1/3 的城市人口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有 1/3 的国土被酸雨侵蚀；经济发达的浙江省，酸雨覆盖率已达到 100%…工业文明在带给国人较前人丰富的物质快乐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加于自然的罪恶。

而作为上帝福地的欧洲，工业革命之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征服和主宰自然的欲望愈发膨胀。18 世纪在普鲁士和萨克森所发明的科学林业表达了人们管理树木的欲望和具体措施；1933 年版《光辉的城市》一书中，建筑设计师勒库布西耶为巴黎、布宜诺斯艾利斯、里约热内卢等城市做的规划设计突出反映了那个时代人类作为独裁者想要改造自然的宏大志向…这一时期，从城市居住到森林土地，欧洲人恣意行使着主人的权力。直到 19 世纪中期，在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征服自然的战争之后也才有了环境保护意识的萌芽。1865 年英国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民间环境保护组织“公共人行道和开放空间保护协会”，从而解开人类与自然和解的序幕。从 19 世纪中、后期自然保护运动发展到 20 世纪上半叶的环境保护主义，再到 20 世纪 60 年代伊始的生态保护主义，欧洲逐渐发展而来的对自然的认识开始重新建构人们的生态认同。从 1850 年法国的《格拉蒙法案》、1876 年英国的《禁止残酷对待动物法》等一批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出现，到 1962 年雷切尔·卡尔森 (Rachel Carson)《寂静的春天》出版，引发群众性环保运动，直至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态保护主义，人类逐渐消解着自己的主宰地位，而开始意识到自然本身存在的“自然性”。

中国无法像欧洲那样将自己工业化所带来的环境负荷或多或少地转嫁给别人，也不拥有上帝福地的宠爱，在刚刚开始现代化的时候便开始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重建“天人合一”所蕴含的生态认同。也是在历经千年沧海桑田之后，中国与欧洲方才开始有了真正意义的同一性。随着中欧环境教育的兴起和发展，人类在重新认识自我和自然的过程中建构起新的生态认同，从价值观、行为方式等各方面实践对于自然的认同感，逐渐明晰人与自然互为相属的理念。

四、结语

1994 年由欧洲环境教育基金会 (FEEE) 管理启动的“生态学校计划”现已在欧洲大陆上遍地开花，而中国各地近年也陆续出现以培养环保意识为目的的各种“绿色学校”，通过教育的方式培养人们对于自然环境的认同感。这样一种生态认同教育，理论上开始反思并重建人类对于自然的生态认同，实践上开始从日常生活到世界性运动（如各种环境组织）改变自我行为方式，人类通过文化的方式重新确立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文化、自然三者的关系我们可以这样表述：



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类与自然界之间以文化为媒介相互作用。对人的社会化直接相关的就是以价值观念为体现的文化，而与自然界直接相关的则是以科学技术、经济体制、社会组织等为体现的文化作用力。故而，在这三者之间，文化呈双向性，在生态认同教育过程中，必须考虑文化因素。历史过程中，人类创造了多样性的文化形态，同时也在文化的作用力下形成了各自对自然的认识。我们

可以说，人类在创造文化的同时也在被文化化，而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也在这个文化化的过程中成为了一种文化的理念。故而我们说，以教育为手段的文化改造路径是在文化自觉中重新建构人类认同自然的上上之策。文化的多样性也赋予了这种教育方式的多样性。从欧洲到中国，当生态认同作为文化目的而成为一种教育方向的时候，便也开始了人与自然真正意义上的对话。

注释：

[1]在本文中有必要对“自然(Nature)”、“生态(Eco-)”、“环境(Environment)”三个概念进行一定的解释和限定。综合各百科书的定义，我们可以这样表述：广义的自然指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整个客观物质世界，狭义的自然指与人类社会相区别的物质世界，本文取广义之“自然”；环境有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分，本文中所谈“环境”为自然环境；自然环境的外延广泛，各种天然因素的总体均可称为自然环境；生态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系统；生态环境是自然环境的一种，其强调的是整体内部各因素之间的生存关系；三者的交集之处便是“生态”，本文取三者的交集之意。

[2] Edited by Roy Ellen and Katsuyoshi Fukui, *Redefining Nature---Ecology, Culture and Domestication*, First published in 1996 by Berg, Oxford. Washington, D.C. P157.

[3] 颜敏：中西环境哲学世界图式之比较，《社会科学研究》，2007.3。

[4] By Emilio.F.Moran: *Human Adaptability*, Westview Press, 2000, P7.

[5] 胡兆量，孙惠淑，阿尔斯郎，琼达：《中国文化地理纲要》，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P231。

[6] 同上，P347。

[7] By Mitchell Thomashow: *Ecological Identity: Becoming a Reflective Environmentalist*, MIT Press, 1996, P3.

[7] 《老子》25章。

[8] 同上。

[9] 《老子》33章。

[10] 颜敏：中西环境哲学世界图式之比较，《社会科学研究》，2007.3。

[11] 全增嘏：《西方哲学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P113。

[12] 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商务印书馆，1996，P598。

[13] 《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

参考文献：

[1] Edited by Roy Ellen and Katsuyoshi Fukui, *Redefining Nature---Ecology, Culture and Domestication* [M], First published in 1996 by Berg, Oxford. Washington, D.C.

[2] By Emilio.F.Moran: *Human Adaptability* [M], Westview Press, 2000,

[3] By Mitchell Thomashow: *Ecological Identity: Becoming a Reflective Environmentalist* [M], MIT Press, 1996.

[4] 胡兆量，孙惠淑，阿尔斯郎，琼达：《中国文化地理纲要》[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

[5] 全增嘏：《西方哲学史》[M] (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6] 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M] (上)，商务印书馆，1996，

- [7] 赵林:《中西文化分野的历史反思》[M],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 8。
- [8] 颜敏: 中西环境哲学世界图式之比较[J], 《社会科学研究》, 2007. 3.
- [9] 吴季松:《看世界——欧洲的循环经济与北非的水》[M],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7. 1.
- [10] 【美】詹姆斯·C·斯科特著, 王晓毅译:《国家的视角》,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11.

Human·Nature·Culture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cological Identity between China and EU

By Linhong

(PHD Candidate of Anthropology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 During the process of human development, nature as an artificial concept is always treated as a wordless object. On the other hand, human as the subject of mind is gradually changing the nature and creating the culture. Finally, human becomes the culturalized human and nature becomes the culturalized nature. Human and nature then have a connection on the level of cultural meaning that is ecological identity. This article tries to compare the ecological identity between China and EU, with the hope of giving some interpretations to relevant questions.

Key words : Ecological Identity Culture China EU

收稿日期: (2008-04-7)

作者简介: 林红 (1980-), 女,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